

新华文摘

【半月刊】



1 2024
ISSN 1001-665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习近平）

基于中国治理实践的行政法学命题转换（石佑启）

电动中国“锂”从何来（郑绵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孙正聿）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顾海良）

和谁？为何？如何？——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的预期及现状（桑 兵）

心海图（林 森）

从课程、教研室到学科：文艺学的中国生产（朱国华）

钱三强：盖世奇功 民族脊梁（钱汉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康 震）

教育强国建设：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朱永新）

事业单位工资分类管理研究（何 宪 等）

三千年印篆史：一部“推陈出新”的历史（韩天衡）



哲 学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 ····· 孙正聿 34
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现代转化 ····· 张 霄 36
从马克思到当代：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 ····· 仰海峰 38

经 济

-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
开拓 ····· 顾海良 44
农业强国若干问题辨析 ····· 何秀荣 50
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观察【两篇】
被放大的旅途终点 ····· 克劳迪娅·戈尔丁 53
一位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的崛起
——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述 ····· 贾拥民 56

历 史

- 和谁？为何？如何？
——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的预期及现状 ····· 桑 兵 58
探源工程所见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 ····· 王 巍 61
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韩国河 王 芳 64
蹴鞠：一“蹴”千年的流行运动 ····· 杨 超 66

文艺作品

- 心海图【中篇小说】 ····· 林 森 68

- 漫画之页（五幅） ····· 赵春青 王 琪 何青云 等 87

- 美术作品** 放飞梦想（三联局部）（中国画）张 琳 杨 可
祖国颂（绢本设色）吴 昊 吕十锁

文艺评论

- 从课程、教研室到学科：文艺学的中国生产 ····· 朱国华 88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词》的起草与精神场域 ····· 斯炎伟 92
庄子美学辨正 ····· 肖 鹰 95

人物与回忆

- 钱三强：盖世奇功 民族脊梁 ····· 钱汉东 98
- 铁骨铮铮一巨树
——怀念牛汉先生 ····· 谢冕 103
- 高镇同：“一门六院士”的播种人 ····· 杨艳梅 周广刚 105
- 石壶往事 ····· 陈寿梅 107

文 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

- 价值导向 ····· 康震 109
- 敦煌莫高窟及其现代文化角色 ····· 樊锦诗 111
-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与推进思路 ····· 张森 115
- 视点【两则】
- 长篇小说究竟该多“长” ····· 潘凯雄 117
- 科技伦理审查为科技向善保驾护航 ····· 高文 118

教 育

- 教育强国建设：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 ····· 朱永新 119
- 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难在哪里 ····· 孟照海 122
- 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政策变迁与机制优化 ····· 王新风 125

管 理

- 事业单位工资分类管理研究 ····· 何宪 熊亮 128
- 发展民营经济要尊重企业家理性 ····· 刘迎秋 132
- 用超级产品引爆增长 ····· 曹虎 133

科学技术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升国家医学科技整体能力

- 吴善超 吴伟 137
- 中国北极科考二十四载：向北而去，探索极地 ····· 何剑锋 140
- 登月航天员是怎么选拔出来的 ····· 庞之浩 142
- 科技点滴（六则） ····· 145

读书与传媒

三千年印象史：一部“推陈出新”的历史 ····· 韩天衡 146

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探索出版学科

自主建设的中国之路 ····· 张树庭 147

符号、形态与场景：面向青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浸润式传播 ····· 张志安 吕伟松 151

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 170

[补白] 强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金观平）33

论点摘编 156 — 169

公共服务场景：概念构建、分析维度
与设计原则

“双重时空”下基层社会结构新特征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坚持三个原则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的
路径

四个维度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之新蓝图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宪法逻辑

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序性困境
与完善

乡村振兴的法治之维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

福柯异托邦的性质与特点

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发展

本哈比对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批判性
反思

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及其意义

知识论与伦理学交汇何以可能

“儒者，术士也”新论

服务零售在消费市场中具有重要作用

应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
盈利空间

汇率波动、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
与人民币结算比重

我国增值税税率优化方案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
的政策衔接

数据要素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
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

“殷”是周人对商王朝国号的改篆

玄谈的历史功能

《四库全书》对清代地理学发展利弊
参半

“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

新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建

当代散文创作的“痛点”与突围

“思想生活”的修辞：王尧的“知识
分子散文”

王国维遗书考论

先秦儒家文道观的建构

“道艺体用”观念与中国写人文论谱
系之构建

比较文学阐释学的理论特征

中国手语信息化的现状与出路

引导农民渐进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中国自然生态类纪录片未来发展建议

寻根文化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完善文化典籍数字内容保障体系

“好教育”的思维建构

体育锻炼能否减少青少年偏差行为

推进数字思政建设 提升网络育人能力

干部能力建设是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问题与创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推进绿色转型

经济类国际人才来华的影响因素

回迁社区的空间失序及其治理

企业基因演化视角的学术创业企业成长

企业隐私政策的未来研究可能

打赢“碳中和”的攻坚战离不开生物质
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新兴科技风险的
反身性治理

政府科技投入、资本扭曲与“科技—
金融”耦合系统效率

人文数学的文化意蕴及价值意义

认知视角下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
响因素

全媒体时代纪录片的基本格局与发展
趋势

表演性劳动：网红的粉丝运作逻辑及
其文化影响

全民阅读要注重名家导读

数智时代应重返人道传播

口述史展现新媒体传播研究进路

稿酬启事：

一、按照国家税务管理有关规定，本刊向作者支付稿酬须履行全额申报和代扣代缴义务。本刊为二次文献，选用刊发稿件前通常不与作者联系，不掌握作者身份证号码、汇款账号等有关信息。请稿件被本刊刊发后未收到稿酬的作者，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我刊有关人员联系，提供本人身份证号及银行卡号相关信息，以便我们及时为您支付稿酬。

联系人：张晓霞

联系电话：010-65242951

电子邮箱：xhwzgc@163.com

二、本刊部分转载文章，原发报刊未注明作者单位，这部分文章作者，如文章被本刊刊发后未收到稿酬，请按以下方式联系查询：

联系人：冯 华

联系电话：64081085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55号2期209室

邮政编码：100010

购刊启事：

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购刊：1. 关注“新华文摘杂志”微信公众号；2. 新华文摘杂志官方网站 www.xinhuaawz.com；3. 请从邮局直接汇款至北京新华文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金隆基大厦，邮编：100706）。汇款时请正楷写清详细地址、邮编、姓名和电话，在附言栏注明欲购刊期、册数及开票单位；定价：小字版每册16元，全年384元；大字版每册19元，全年456元。详情请致电010-65170515。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词》的起草与精神场域

斯炎伟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体与会代表作《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是第四次文代会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会议组织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新旧文艺观念剧烈交锋的历史时期,文艺界亟需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出面,对“文革”结束以来一直争论不下的许多文艺问题,给出清晰的界定与解答,为正在重启的文艺创作指明方向。但这种基于大历史观的评价也容易使人们对《祝词》形成一种简单的“破”与“立”的认知,忽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祝词》的起草及其精神讨论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罅隙”。作为新时期文艺创作和管理的一个原发性文献,《祝词》需要被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细致考察。

一、《祝词》的起草与大会反响

《祝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然而有关其起草的具体细节,却一直鲜有史料述及。直到2005年邓力群出版《自述》,“自述”对《祝词》的起草作了如此叙述:“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

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由于要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文艺运动,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胡乔木、邓力群在看完报告初稿后联合署名致信胡耀邦和周扬,就三个问题提出了意见:一、报告应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希望在新形势下作出新的、好的提法;二、如何界定新时期文艺的目标、任务和功能;三、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党将来要如何领导文艺。信中对这些问题的诸多思考,不同程度地与胡耀邦的意见不谋而合。比如关于新时期文学艺术目的、任务等的界定,胡乔木在信中就明确提到“可加上胡耀邦同志提的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意思”。而且,从信中所提意见以及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报告的讨论情况来看,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胡乔木的看法较周扬更明确,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方面,胡乔木比周扬更坚决。对照后来公开发表的《祝词》可知,胡乔木、邓力群信中提及的不少意见均不同程度地被写入了文本之中。

依照邓小平的指示,《祝词》是一种言简意赅的“顶层设计”。《祝词》虽然只有四千余字的篇幅,但每每落笔当时的文坛关切,包括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和文艺工作者队伍,如何看待当时的文艺局势,如何定位和开展新时期文艺工作等。在那个思想观念充满分歧、国家中心工作正面临转轨的历史时期,《祝词》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既在整体上坚持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对它加以必要的发展;既体

现着党对过去文艺工作的反思,又饱含着国家对文艺工作者重返岗位的热切期盼;既凝聚着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又不乏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展望与设计。结合历史与现实,《祝词》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当时许多困扰着文艺界并迫切需要作出解答的问题。

《祝词》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排山倒海的掌声”。然而,思想解放的艰难与曲折,也决定了《祝词》在当时并不可能被一味地叫好。会场对《祝词》其实还存在另外两种声音。一种是对《祝词》的精神能否落地心存疑虑。另一种声音是认为思想解放过了头。这些情况说明,《祝词》的精神短时间内在文艺界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对一些观念转变相对滞后的人士来说,《祝词》的深入人心还需时日。

二、“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祝词》与党的文艺方向的调整

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前,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配合政治的需要。这一集体意识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等说法,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被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圭臬提出。“文革”时期,“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断更是被极左文艺界化作“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僵死教条,成为“文革”文艺的行为准则。

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过程中,“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深深触动了文艺界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反思。1979年4月在京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上,与



会人员普遍表达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不满,认为这一口号让文艺“成了政治任务的附属品,抹杀了文艺的独特性”。随后,引发文艺界广泛关注的《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更为尖锐地揭示了文艺的“工具论”所具有的片面性和危害性。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迅速升温,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声音汇聚成一种社会思潮,全面回顾与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历史节点已到来。

作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祝词》必须对这一文坛重大关切作出直面回应。有两个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祝词》起草工作的面前。

第一个问题是,大会是否仍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一问题不仅民间争论激烈,而且官方管理层的意见也不统一。作为“十七年”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并不反对“一贯如此”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表示必须警惕文艺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服务,以及重点应该考虑“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则主张“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因为它“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积累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因此应该推出一个“使人一新耳目”的提法。直到1979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大会《祝词》和主题报告时,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仍各执己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听取胡乔木的意见时插话表示,“这个口号带来了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由此,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最终有了“不再提为好”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不再沿用已有提法,那么新形势下党在文艺方向上的新口号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事实上文艺界在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就已有触

及,也形成了一些说法。比如有人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意见,认为“今后应该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党的利益都是为人民的利益。我们社会主义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足人民对文艺的需要”。部分中央领导人对此也有一些大致的想法。比如胡耀邦就曾谈过文学艺术“要为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发生作用”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胡乔木也说文学艺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在培养新人方面,在影响人的世界观、政治观、道德品质方面,在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方面,产生影响、起作用”。但关于第四次文代会要具体提一个什么样的文艺口号,当时的情形并没有留给党中央足够的时间来酝酿和讨论。

《祝词》起草小组在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连夜对文稿进行了最终修定。10月30日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作《祝词》时,历史性地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文艺口号。

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转而明确指出“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之“根本”,这是《祝词》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

首先,“人民”此前虽未曾上升为党的文艺口号,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存在,从“政治”到“人民”,党实现了在文艺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重大变化,但它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并不构成越界或否定。《讲话》提出了“为工农兵”的文艺方

向,但其解答这一问题的逻辑基点则是“为人民”,是毛泽东在作引言时所指出的文艺应该“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以及在作结论时援引列宁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正因如此,《讲话》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表述。毛泽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即兴讲话,则更清晰地体现着“人民”在其文艺观念中绝对重要的地位:“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因为你们都是人民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因此《祝词》提出文艺“为人民”而非“为政治”,在根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指导精神的。

其次,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作的必要发展。在特别需要国家发挥“顶层调度”功能的历史时期,《祝词》用“人民”来取代“政治”,彰显的是国家对“人民”时代主人身份的确认,暗合着党在新时期对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重返岗位、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的召唤与动员。因此,提出“文艺属于人民”是党面对新形势的正确选择,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性推进。

再次,用“人民”卸载“政治”,也是《祝词》极富政治智慧之举。相较于“政治”,“人民”的话语范畴显然要开阔得多,它给文艺创作以更大的主体性与空间度,为新时期文艺的复苏与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人民”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成为国家“政治”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对人民负责”,就使文艺自然与“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发生了关联。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人民”让《祝词》获得了更富弹性与创造性的表述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祝词》提出的这一文艺新口号,在当时同样并不



是被所有人完全理解的。

种种认识上的分歧,客观上推进了对问题的探讨。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对第四次文代会文艺方向的调整问题作出专门解释:“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随后中央决定通过座谈会、个别交谈等多种形式,充分研究新时期文艺工作总口号的提法问题。经过半年多的讨论,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新时期党文艺工作的“二为”方针。至此,“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获得了更全面、科学的解释,并历史性地融入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征程之中。

三、“不要横加干涉”:《祝词》与党领导文艺方式的转变

在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意识到文化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并通过实践摸索,形成了一套相对自足的文化领导模式。这种文化领导模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党通过组建并运作一系列由其领导的文艺机构、部门与组织,来实现党对文化的思想领导。延安时期,党通过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创办“鲁艺”、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整风运动和文艺活动等组织化方式,成功地将“工农兵文艺”塑造成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共识,并开创了“工农兵文艺”实践的繁荣局面,在当时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中国组建伊始,作为历史经验,党领导文化的“延安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党实现了对新中国文艺的领导,大会不仅宣喻了“工农兵文艺”是未来新中国文艺“唯一正确”的方向,也成立了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

在“十七年”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这种领导方式有一定的历

史优势,也获得了一定的现实效应。但这种文艺领导方式在客观上也存在“失范”的风险。

对党曾以简单的行政方式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不满,在“十七年”的文艺界就已有所展露。这种不满情绪的公共化,则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不满之余多了反思,并且思考的触角开始向“十七年”文坛延伸。围绕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尤其是大会主题报告的起草与修改,文艺界人士对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意见不仅集中爆发,而且不乏尖锐。

较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央对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的认识更明确,意见也更统一。结合文艺界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祝词》对新时期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作出了让当时众多与会代表“终生难忘”也是被后来文艺界和研究界屡屡援引的经典阐述: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这段被在场的记者描述为“小平同志讲话中反应最激烈的”文字,不仅向文艺界表明了党要历史性改变文艺领导方式的态度,也蕴含着新形势下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丰富信息。首先,它界定了“领导”的含义:不是根据“政治任务”来“发号施令”,而是“帮助文艺工作者”更好地从事创作。其次,它

提出了新的领导作风:是“平等地交换意见”,而不是“衙门”作派。再次,它指出了领导的原则:“行政”不多介入,“废止”行政命令,对作家的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祝词》关于新时期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表述,既切中了以往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曾出现过的问题,也为党振兴新时期文艺事业提供了领导政策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祝词》在这一问题上的措辞特别坚决,多用“不是”“而是”“必须”“只能”“不要”等态度鲜明的词汇,而且“代表们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在讲到‘不要横加干涉’时,还特别加重了语气”,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党在改变文艺领导方式问题上“不能再沉默”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精神在《祝词》里可以被表述得条分缕析、意旨鲜明,但在具体落实时碰到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首先,《祝词》传达的文艺领导精神与文艺界接受的领导精神并非完全一致的。具体讲,在对“不要横加干涉”的理解上,中央和文艺界是存在龃龉的。这种理解上的差异虽然双方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事实上为党随后文艺领导工作的开展预设了难度。

其次,如何区分“必要的领导”与“行政干涉”,这在文艺领导实践中也往往很复杂。《祝词》提出的文艺领导方式在现实运作层面更像是一门学问,需要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不要横加干涉”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种精神,在现实中需要辩证地看待和贯彻。碰到问题时,要对问题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处理问题时,也要“充分发扬民主,平等待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正面引导”。这或许是我们全面理解《祝词》关于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精神的一个根本。✱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原文约12000字)